

書評

全球焚化：反民主的意識抬頭與氣候危機四伏

Global Burning : Rising Antidemocracy and the Climate Crisis

張 薰 Hsun Chang

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生

*Doctoral Student of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世界正在燃燒，而縱火犯正是扼殺全球未來的我們。2023 年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宣告 COVID-19 疫情落幕，惟疫情的餘燼並未隨著 WHO 的發布而熄滅，病毒仍如毒瘤般以各種危機在世界各地不平等地侵蝕著人類安全，¹ 無疑的是，氣候變遷(climate change)加劇了這場流行病的嚴重性，同時亦增加了諸多不平等的現象。² 本書撰寫於 2020 年，作者

¹ 在疫情期間，可以認知到風險是系統性(systematic)，公衛危機將為轉型為生活不同層面的威脅。換言之，公衛安全必然與人類安全下其餘的 6 個子議題(sub-types)具有一定程度的關聯性本書。詳見：United Nations, “Impact of Pandemic, Worldwide Crises Must be Overcome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peakers Stress, as High-Level Political Forum Open,” (July 2023), via at: <https://press.un.org/en/2023/ecosoc7134.doc.htm>.

² Eve Darian-Smith, *Global Burning: Rising Antidemocracy and the Climate Crisi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2), p. 9; Jonathan Gamu, Philippe Le Billon and Samuel Spiegel, “Extractive Industries and Poverty: A Review of Recent Findings and Linkage Mechanisms,” *The Extractive Industries and Society*, Vol. 2 (2015): 162-176;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 “The COVID-19 Shock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Towards A “Whatever It Takes” (2020), via at:

Eve Darian-Smith 提出自由市場威權主義(free-market authoritarianism)以及採掘資本主義(extractive capitalism)兩種現象共同導致了全球氣候變遷，而在兩種主義與氣候變遷三者同時的交互作用下，災難性野火(catastrophic wildfire)的發生頻率與規模將大幅提升。

Darian-Smith 藉由觀察 2018 年至 2020 年的三個民主國家：巴西、美國以及澳洲，並進行制度與領導人層面的比較個案分析，本書核心關切威權主義在全球各地崛起的情形下，人類應以何種方式應對全球氣候變遷；而作者認為極端右派領導人的崛起為助長災難性野火加劇的主因，COVID-19 及其衝擊應作為世人對未來環境危機的預兆與警惕，人們應秉持著火焰般的思考省思迄今全球經濟和政治嚴重不平等狀況。隨著疫苗的問世，人類或許可以恢復既往的生活；惟貪婪地焚燒森林、放任威權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病灶將會無可避免地將未來推向火坑。

一、資本主義與自然資源採掘

巴西、澳洲與美國分別遭受不啻一場的大規模火災的肆虐，Darian-Smith 認定巴西政府是蓄意縱火，而澳洲與美國政府則是默許火災的發生，作者發現這三國具有共同特徵並加劇了災難性森林大火的发生頻率：首先，三國皆存在欠缺完備環境檢管制度的「採掘資本主義」，其次是國內存在加劇氣候不正義的「極端不平等與脆弱群體」，第三則是政府領導人與企業的「自由市場威權主義」。實際上，此三國對於全球氣候變遷應負有重責大任，他們除了是全球溫室氣體年排放率最高的前十四個國家，巴澳美政府在政治與經濟上透過激勵並合法授權企業污染大規模的環境；³ 而每當災難型野火發生時，政府便採取消極處置之態度，甚至公然阻止、無視或廢除環境保護法和執行的監管機構。

一般森林野火與災難型野火的差異在於一氣候變遷是否為作為引燃火災

https://unctad.org/en/PublicationsLibrary/gds_tdr2019_covid2_en.pdf.

³ Darian-Smith, *op. cit.*, pp. 12-19.

的關鍵變量；⁴ 詳言之，氣候變遷的累積影響是由一系列監管鬆散、具有環境風險的活動及其企業之作為所加劇而成的（例如：能源生產、工業化農業、採礦和鑽探以及大規模開挖地下水等）；因此，災難型野火可謂人類蓄意或漠視環境正義(Environmental Justice)所積累之果報。迄今，資本主義與自然資源開採的技術與開發程度已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此現象可歸因於政府對資源的權力已多半移轉至由企業發號施令的銀行與金融部門；換言之，在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的脈絡下，經濟體系日趨劫持了政治制度；而經貿全球化之普及使得人們對於自由經濟市場的約束與民主政府之間的控制不再感到矛盾與敏感，⁵ 反倒成為了一種習慣與常態。部分學者認為人力資源與非人力資源的商品化與用途多樣化，鑑於該模型的設計是從人或資源汲取了經濟價值，此種現象又可被稱作榨取資本主義（又稱採掘資本主義）。

「採掘資本主義」係指現今的資本主義伴隨著人類和非人類環境的極度惡化的過程，亦泛指開採包括礦產與土地等自然資源。「採掘者」將資源轉化為商品出售以獲取利潤，然土地的持有者以及與自然資源密切相關的族群並非是採掘資本主義下的受益者，反倒經常成為了資本主義下的犧牲者。此種模式涉及採掘者與資源持有相關者（被採掘者）之權力關係，其本質上為一非互惠且具剝削型態之互動模式，不論從大航海時期直至今日的全球淨零轉型對於綠色金屬(green mining)的需求，以利潤（益）為導向的商業模式，大幅加劇了全球不平等與依附關係。學者 Estes 認為「土地即是權力與財富，更重要的是，土地和種族階級具有密切關聯。與土地的關係（誰擁有土地、誰耕種土地以及誰關心這片土地）反映了美國被視為全世界嚴重不平等、殖民主義與白人至上主義的遺產。」⁶，加州的天然氣與電力公司（Pacific Gas and

⁴ 氣候變遷不僅僅是生態系的一部分，它也是促成循環的原因之一。在生態系的循環中，自然引發的森林野火可造就物種的生滅以及循環，並形成一種自然的規律現象。惟災難性野火的不定時引燃將打破既有的生態平衡，反而造成生態系的浩劫。

⁵ Wendy Brown, *In the Ruins of Neoliberalism: The Rise of Antidemocratic Politics in the We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 35, 70.

⁶ Bill Gates 在近年來已成為美國最大的農地私人所有者。詳見：Nick Estes, *Our History Is*

Electric Company, PG&E)為求利益的縱火案與環境保護措施背道而馳。而澳洲自 1990 年起，其中之一主要的產業即是化石燃料生產和採礦業，該國已成為全球壓倒性的「採石經濟體」(quarry economy)；與此同時，掌控全國多數的極右派媒體控制了公眾敘事，「全球暖化否定說」(global warming denial)的思維更在主流媒體上誇飾性地報導，⁷ 政府已在經濟安全層面上出現超額需求，對於經濟的渴望遠超越其於危機所帶來的威脅。

鑑於美中的貿易戰不斷延燒，以農業綜合企業與礦產為盛的巴西，已超越阿根廷與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大豆出口國，惟伐林(deforestation)耕地的行為已造成生態反撲，同時亦受到國際的責難與施壓。即使在 2005 年至 2012 年有暫時趨緩伐林更地，然自 2009 年 Jair Bolsonaro 政府的上台，隨即而來的是向農業企業承諾開放雨林，並將原住民控對雨林的控權從國家印第安人基金會(National Indian Foundation, FUNAI)移交給農業部；此外，Bolsonaro 政府更採取一連串的手段降低監管制度，在疫情期間大幅開採金屬礦產並吸引外資流入，該行為更將人民暴露於公衛危機的風險中。⁸ 綜上個案觀之，經濟的誘因遠高過於氣候變遷的危機意識，以利潤為導向的企業和與之勾結的政客完全無視人類和非人類的生命，導致了近年來災難性野火的規模升級；而伴隨全球氣溫的提高，熱浪、乾旱與洪水等極端氣候將更頻繁地出現。

the Future: Standing Rock Versus the Dakota Access Pipeline, and the Long Tradition of Indigenous Resistance. (London: Verso, 2019), p. 41.

⁷ 鑑於新聞和社群媒體缺乏監管，抑或公眾敘事多由特定群體掌控，恐造成高度政治化和偏見。

⁸ Bolsonaro 在 2019 年以「烈日日」(Fire Day)呼籲農民大量焚燒被砍伐的雨林，並支持其私人投資者開放公共土地的計劃。2020 年疫情期間，農業部長 Ricardo Salles 更呼籲政府進一步放鬆對環境政策的管制。詳見：Darian-Smith, *op. cit.*, pp. 63-65; Fernando Ferreira de Castro, Geraldo Sandoval Góes, Jose Antonio Sena do Nascimento, Monica Monnerat Tardin, “Incidences of COVID-19 In Major Mining Municipalities in The Brazilian Amazon: Economic Impacts, Risks and Lessons” *The Extractive Industries and Society*, Vol. 9(2022): 1-8

二、氣候危機的開膛手：自由市場威權主義

災難性野火的規模提升伴隨著氣候變遷下全球反民主意識的興起，Darian-Smith 將此種趨勢以「自由市場威權主義」稱之，在資本主義的脈絡下行使反民主手段，例如：設立新聞監管制度(censorship)、消減教育與醫療經費、破壞司法獨立等。越來越多自稱自由民主的國家傾向將權力集中在特定領導人或菁英團體的手上，然而他們並未平等的對人民負責。⁹ 作者亦提及新自由主義實為一種激進的意識形態，透過制度的建立讓企業能夠接管國內和國際層面的監管機構，並相對地提升企業的盈利目標。與此同時，新自由主義亦將反民主邏輯注入全球體系，甚至興起威權新自由主義(authoritarian neoliberalism)。

Darian-Smith 歸納自由市場裡的威權主義具有三項特徵：第一是極端民族主義(ultranationalism)的政策，透過響亮的口號宣揚獨有的民族認同觀念，並透過動員本土主義敘事(nativist narratives)喚起種族或文明的優越感。並同時體現國際孤立主義(international isolationism)於保護主義貿易政策，例如：高喊著「讓美國再次偉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口號。第二，退出合作性多邊主義(multilateralism)機制，相較於乘載於共同治理的模式上，更多國家則選擇有利自身的最佳獲益並採取獨立行動。第三，反環保主義(antienvironmentalism)，自 2008 年後經濟衰退石油與礦物儲量下降以及糧食不安全情形加劇，生態的浩劫更提升了政府對資源掌控的慾望，同時亦主張捍衛企業以享有延續執政的可能性；職是之故，作者認為自由市場威權主義與採掘資本主義之間關係的深化也導致了國家對經濟管制的放鬆；與此同時，政治領導人將氣候變遷及其引發的野火武器化，以推進其有利特定群體的政治議程。

⁹ Darian-Smith, *op. cit.*, p. 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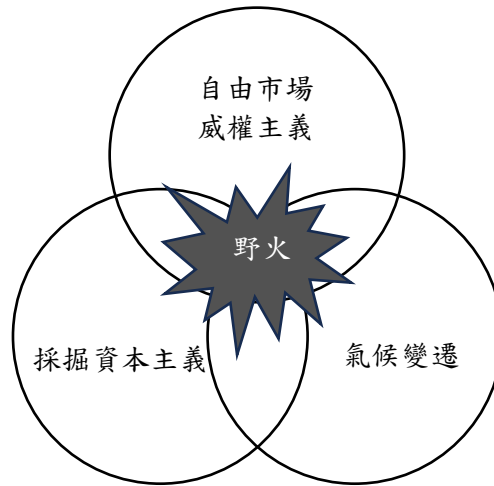


圖1：災難性野火關係圖

資料來源：Darian-Smith, *op. cit.*, p. 93.

說明：自由市場威權主義之具體作為包括極端民族主義、國際孤立主義、單邊主義、氣候變遷定說以及降低環境保護管制。自由市場威權主義與採掘資本主義兩種現象共同導致了全球氣候變遷，而在兩種主義與氣候變遷同時的交互影響下，災難性野火的發生頻率與規模將大幅提升。

三、氣候變遷下的煉獄：暴力環境種族主義

「系統性種族暴力」(systemic racial violence)是「系統性環境種族主義」(systemic environmental racism)中時常被忽略的一環，意即氣候變遷易威脅環境中特定的脆弱群體並施行暴力，這些脆弱群體除了相對容易受到自然災害的衝擊，同時多半亦缺乏危機處理的能力與資源。災難性野火將加劇既有的脆弱性，並針對種族、性別以及政治經濟下邊緣化的人群造成不成比例的侵害。本書認為應連結以下兩種現象並將其視為一體，進而關懷與省思環境種族主義所造成的迫害：一、威權領導然通常以「法律與秩序」為由，藉由軍事警察對付本國公民，以確保採掘資本主義的經濟獲益；二，快速的氣候變遷、極端氣候和災難性野火數量與強度的增加，對邊緣族群造成歧異性的影響。

儘管現今社會已邁向多元化，種族、族群歧視以及壓榨弱勢群體的生態仍持續發生在世界各地，而政府亦為氣候不正義下的筷子手之一，澳洲政府對於金屬礦產的干預政策剝奪了在地原住民的權益，冠冕堂皇的轉型措施與補貼政策最後成為了遙遙無期的土地糾紛，該政府從簽訂 5 年的土地租約後來轉為 90 年的監管權，隨後政府將監管權再進一步分配給採礦公司。榨取資本主義致使原住民與弱勢群體經歷了多種形式的死亡，從殖民時期直至現今政府政策，代際不正義與經濟不公反覆以不同形態出現。在巴西的個案中，置身採礦業最前線的低階勞動人口與無證難民被視為低於人類、不符合規範且可被拋棄的人們。在不受地理與時空條件的約束下，暴力、種族主義、軍事化、鎮壓以及過早死亡(*premature deaths*)，成為了本世紀氣候變遷下自由市場威權主義之標誌。

四、結語

本書將「野火」視為多種代表性的象徵：火苗源起、加劇烈火燃燒的採掘資本主義、將野火視為武器施行自由市場威權主義，以及暴力環境主義下所塑之煉獄。Darian-Smith 以災難性野火為主軸，透過美國、巴西與澳洲的比較個案分析揭示了全球氣候變遷下環境政治經濟學以及反民主化交互作用所致之嚴重性。民主化與資本主義反覆以不同形式出現在不同世代；惟當危機四伏時，民主化與資本主義亦成為了加劇既有不平等現象以及加速氣候變遷的工具，貪婪的人性以及資本主義下的不公正根植於國家內部與南北國家；毋寧，作者認為應以野火為核心反思氣候變遷的治理模式，方能遏止更大的禍害。2023 年，作為史上最熱的一年，即使國際已擁有共識致力於淨零排放(*net-zero*)的能源轉型；惟轉型的過程中，世界的暴力並不會停止，氣候危機將持續對個體造成歧異的衝擊，而這些危機都將在全球焚化的時代下交織成為國家更大的隱患。

責任編輯：蔡旻綦